

曲青山 高永中 主编

# 第二届 全国党史文化论坛文集

第三册 党史文化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 第二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文集

### 第三册

# 党史文化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

曲青山 高永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党史文化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  
中共党史出版社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11

(第二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文集;3)

ISBN 978-7-5098-3369-8

I. ①党…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中国共产党一党史一文集  
②抗日战争—中国一文集

IV. ①D23—53 ②K26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4623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聪

复 审:李亚平

终 审:汪晓军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914 千字

印 张:56.25

印 数:1—1050 册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3369-8

定 价:105.00 元

---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 目 录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形态对

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推动 /王 刚 /1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宣传思想中的群众观 /陈丽红 /16

抗战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论析 /曹子洋 /28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抗战时期党的文化队伍建设 /聂红琴 /43

抗战时期中共政党文化社会化的教育路径 /武加福 /53

探究八路军文化的现实价值 /巨文辉 /63

论新四军文化建设工作 /石 雷 /69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研究的意义 /黄延敏 /80

中共七大文化思想的多维观照 /陈答才 张 丽 /91

论中华民族抗战精神 /张洪兴 /104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研究 /宋永永 付会财 马建波 /114

川陕苏区的抗日宣传 /刘应兵 /126

抗战时期中共新闻宣传经验的历史解析

——以晋察冀边区党的新闻宣传为考察中心 /把增强 王利民 /134

抗战时期冀鲁豫边区整风学习运动述论 /向 伟 /141

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的文化教育工作 /牛保良 /154

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牛建立 /162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东南进步文化活动 /毛立红 /173

《新民主主义论》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传播及其反响 /裴 植 /186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

的理论和实践 /武 星 /203

- 延安整风与党内的思想教育运动 /王英敏 /215
- 从延安时期“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作风  
看党史文化的精神魅力 /魏彩苹 /227
- 抗战时期中共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弘扬、发展与启示 /易向农 /239
- 八路军影像文化事业概要述评 /刘中刚 /249
- 左翼电影运动与《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吴海勇 /263
- 延安文艺座谈会 对革命美术发展的影响 /吴继金 /274
- 邓小平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文化工作 /李 蓉 /281
- 论抗战时期邓小平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践 /周元刚 /293
- 从边缘到中心：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在  
中共中间势力统战中的地位演变 /洪富忠 /302
- 浅述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占区文化政策和实践 /刘若璇 /314
- 试论抗战中党对山西文化建设的重视 /王家进 /321
-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从抗战时期内蒙古地区的中日文化较量解析党史文化承担  
的重大责任 /陈艳平 /331
- 抗战时期日本殖民者对辽宁殖民地思想  
文化统治特点初探 /史金龙 /341
- 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运动再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姚宏志 /354
- 苏北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历程和特点 /冯 鹰 /371
- 试论我们党对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韦泽洋 /381
- 论党对浙江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 /倪 清 /392
- 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 /姜卫东 /405
- 嘉兴抗战文化运动述论 /李 伟 /411
- 略论抗战时期中共在福建的报刊宣传 /傅奕群 /418
- 中国共产党与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厦门分会 /朱新屋 /428
- 南靖抗日救亡宣传的党史文化特征 /蔡建南 /443
- 对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小学教育的历史考察 /张 辉 /454

中国共产党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活动 /丁卫平 郑肖辰 /467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山东抗日

根据地文艺工作的影响 /郑肖辰 /480

湖南抗战文化的繁荣及其启示 /王文珍 朱柏林 /487

湖南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萧栋梁 /498

略论中共广东党组织引领下的广东抗战文化运动 /游慧冰 /512

法租界广州湾的抗战文化 /屈康慧 /525

抗战期间中共地下组织在黔北的舆论谋略试析 /王周德 /533

从陇东红色歌谣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党史文化 /李荣珍 /544

新疆抗战文化的形成、传播及其历史贡献 /向干国 /555

试述中共抗战思想影响下的台湾

义勇队抗日救亡文化工作 /孙 瑛 /567

传承抗战历史文化 增进台胞国家认同 /方永乐 方 宇 于昌华 /578

手笔如刀:《抗战》三日刊在抗战初期的

民众动员 /吴仁明 谢 卫 廖乾翔 /588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观

——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为中心的考察 /李晨升 冯夏根 /600

《新华日报》与抗战宣传 /王 前 /620

试论抗战时期廖承志在香港领导的创办报刊

活动及历史功绩 /陈雷刚 /631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新闻战线上的斗争 /王晓岚 /642

中共抗日战争纪念的历史演进 /陈金龙 /654

革命符号与政治象征: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纪念空间研究 /胡国胜 /667

纪念红色节日与党史文化的传承 /许晓敏 王全有 /682

浅论抗战时期中共对成吉思汗的纪念活动 /吴修申 宋江华 /691

关于党史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吴桂韩 /700

党史文化研究的“新文化史”视角 /郭若平 /712

潜心学好党史,为弘扬党史文化而努力 /李维嘉 /725

- 党史文化演进视角下的中共党史研究 /李卫永 /734
- 论党史文化的社会功能 /朱小理 杨宇光 /741
- 红色旅游:党史文化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蒲东恩 /747
- 关于如何发展承载着党史文化的红色旅游的几点思考 /邢济萍 /755
- 新时期党史文化的理论建构 /郑晓亮 /763
- 抓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契机 推进党史文化建设 /王荣梅 /774
- “小康社会”概念体现出党史文化创新的三个来源 /张原诚 /783
- 党史文化建设中对民间艺术年画的改造和利用 /孙 丹 /790
- 论网络时代背景下的党史文化建设 /董史烈 /801
- 党史文化宣传应跨越经验宣传的“卡夫丁峡谷” /甄玉平 /806
- 革命纪念馆传播党史文化必须符合“两个务必” /张秋兵 /816
- 试论党史文化和廉政文化 /阳 琼 /825
- 论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罗生福 /834
- 围绕中国梦打造微阵地 加强党史文化软实力建设 /刘 旋 /844
- 弘扬党史文化传统 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汤家庆 /857
- 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大力推动人民军队  
特色军事历史文化创新发展 /赵建利 /863
- 重大题材影视创作与党史文化普及 /夏远生 /871
- 在第二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闭幕会上的总结讲话 /徐 静 /882
- 第二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综述 /朱昌裕 /885
- 后 记 /891

#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形态

## 对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推动

王 刚<sup>①</sup>

形态是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把双方结合的过程和结果真实地表现出来,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这种形态表现为实践探索、理论创新和政策执行,由此相应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政策形态,它们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一、实践形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推动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形态上主要表现为新启蒙运动和延安文化运动,它们在实践形态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第一,新启蒙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路向。

新启蒙运动是指1936年9月至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联合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继承五四启蒙运动为宗旨,为“挽救国难”而发起的有关思想、文化和社会的活动。<sup>②</sup>对此,艾思奇指出,新启蒙运动就是“要从黑暗的中古时代的睡梦中把民

---

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1YJA710047)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② 陈亚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由来》,《学习时报》2006年10月16日;俞红:《论新启蒙运动》,《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卢毅:《新启蒙运动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长白学刊》2008年第1期;欧阳军喜:《论新启蒙运动》,《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

众唤醒,使他们能够自觉到自己的现实的存在”<sup>①</sup>,即为了把人从封建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都觉悟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有个性的人。

新启蒙运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显著的民族性和大众性。这正如张申府所说:“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却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sup>②</sup>相较于五四运动,新启蒙运动对理性和知识比较重视,也更加重视新文化的建设性。它并不仅仅是对此前的启蒙运动的简单继承,更重要的是试图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实现一种新的超越,“建设现代文化的体系,就成为‘新启蒙运动’当中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sup>③</sup>,即“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sup>④</sup>。

由于新启蒙运动兼具科学性与民主性,大众性与民族性的特点,所以使其“影响了抗战时期的延安文化乃至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的发展”<sup>⑤</sup>。新启蒙运动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且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革命色彩,“可以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声”<sup>⑥</sup>。在新启蒙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化”思潮的演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向发展。

20世纪30年代初,针对当时“还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是没有人屑于这样尝试”<sup>⑦</sup>做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工作的状况,从1934年起,艾思奇出版《大众哲学》一书,这部著作把高深的哲学理论用通俗的语言、人民大众所熟悉的事例加以解释,打破了哲学神秘的观点,拉近了哲学与人民大众的距离。继艾思奇之后,沈志远、陈唯实、胡绳、李达等一批哲学工作者也纷纷开始从事哲学通俗化的研究,从而使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运动。陈唯实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一书中率先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sup>⑧</sup>的主张。接着张申府提出了“科学中国化”<sup>⑨</sup>的主张。

① 《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414页。

② 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北平新报》1937年5月2日。

③ 于刚:《怎样认识“新启蒙运动”》,《北方青年》1937年6月3日第1卷第1期。

④ 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北平新报》1937年5月2日。

⑤ 房德邻:《再评19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载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0页。

⑥ 韩星:《孔学述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⑦ 《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页。

⑧ 陈唯实:《通俗辩证法讲话》,上海新东方出版社1936年版,第7页。

⑨ 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89页。

在哲学通俗化、大众化基础上,1938年4月,艾思奇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进一步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提升到“中国化”的认识高度。他说,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仅仅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因为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并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才能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更深入的传播,又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从而产生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他向哲学界呼吁:“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sup>①</sup>

对于如何才能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艾思奇《关于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中指出,除了要学习、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外,“原则上不外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sup>②</sup>。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注重中国传统哲学遗产,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一阐释思路与胡绳在《辩证唯物论入门》中提出的思路基本相似。胡绳认为,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化”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于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二是“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sup>③</sup>。艾思奇、胡绳提出的这些原则既是哲学中国化的必经途径,实际上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基本途径。<sup>④</sup>

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毛泽东就详细阅读了李达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并作有大量的批注,而“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sup>⑤</sup>;他还认真阅读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称“得益很多”<sup>⑥</sup>。这种“中国化”也波及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当时甚至出现了“中国化”旗帜争夺的现象。国民党御用哲学家叶青宣称:孙中山的

①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387页。

②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420页。

③ 《胡绳全书》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④ 李方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潮互动》,《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⑤ 《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⑥ 《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三民主义已经完成了西方思想的中国化,“孙先生虽然没有讲中国化三个字,却在实际上是中国化底开始者、实行者和成功者”<sup>①</sup>。

新启蒙运动虽然只持续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但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由此推动了延安的革命文化运动,而后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

## 第二,延安革命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推动。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化工作,他曾明确提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sup>②</sup>随着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延安,延安的革命文化运动也随之开展起来。在延安的革命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化”思潮的演化按照: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向发展。

如果说在新启蒙运动中,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通俗化、大众化实现了中国化,那么正是在延安革命文化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理论、思想文化、文艺理论等其他各方面通过在中国的具体化、通俗化都实现了中国化。

**一是文化运动的中国化。**1937年11月,从贤在《现阶段的文化工作》一文中提出了“文化运动中国化”问题。他说,过去的新文化运动(指五四以来),“外国气味实在太重了”,这是它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要使文化运动真正成为中国广大民众的文化运动,就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中国化。<sup>③</sup>随后李初梨在《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问题。李初梨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化取得了进步,但这项工作还“仍然不够”,因此,现阶段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sup>④</sup>应该指出,李初梨当时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视为文化工作的具体任务之一,而不是把它视为党的指导思想,更没有详细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具体内涵,但他提出的这一问题,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叶青:《论学术中国化》,《时代精神》1939年8月10日创刊号;转引自陈亚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由来》,《学习时报》2006年10月16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

③ 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解放》1937年11月13日第23期。

④ 李初梨:《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解放》1937年11月20日第24期。

命题的提出作了思想准备。<sup>①</sup>

**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陈伯达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根据自己民族的特点，根据自己民族的许多历史斗争条件，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而为自己民族解放的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而奋斗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陈伯达说：“中国共产党善于接受我们民族一切最好的文化思想遗产，这就增加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无限价值，同时也正增加着我们民族一切最好的文化思想遗产的价值。”<sup>②</sup>中共中央也发出文件“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sup>③</sup>。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具体化、中国化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化中国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中国化，陈伯达论述的较为充分和系统。他认为“应用在各民族的具体历史斗争中，能够善于考察、研究，探索和熟悉各民族的特殊和固有之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伟大的特点之一，并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的性质，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加以具体的发挥和充实，善于规定自己奋斗的方法和步骤”<sup>④</sup>。陈伯达的观点“实际上指向了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sup>⑤</sup>。陈伯达的这些理论对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起铺垫的作用。<sup>⑥</sup>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陈伯达，他们都认为应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对于毛泽东来说，如果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中

---

① 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汪信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② 陈伯达：《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而作》，《解放》1938年7月1日第43、44合刊。

③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④ 陈伯达：《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而作》，《解放》1938年7月1日第43、44合刊。

⑤ 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 — tung, Ch' en Po — Ta &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5-36.

⑥ 周全华、马爱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消失及重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2期。

国化,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变成“无生命的教条”,对于陈伯达来说则不过是“空谈”。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的基础上,毛泽东从自身的革命经验出发,比陈伯达更进一步并且表现得更为强硬些,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尽管这个词“似乎是毛泽东从陈伯达那里得到的”<sup>①</sup>。

新启蒙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方向延伸;而延安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沿着:“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中国化”方向延伸,这两个实践路向在“中国化”上实现了交汇,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二、理论形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推动

理论形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推动,建立在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成果的积累,到抗战时期这种积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从而在理论形态上推动了马克思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第一,从“适合者行之”到研究中国“地盘内的情形”。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当时一些党的领导人就已经看到在中国具体国情条件下应用马克思主义具有特殊性,因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早在1920年李大钊就曾指出,社会主义理想要“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与英、德、俄”<sup>②</sup>不同。这说明,李大钊当时已经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共性)与中国“各地、各时之情形”(特性)相结合。毛泽东也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sup>③</sup>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地盘内的情形”就是指中国的实际情况。恽代英说得更为明了,他说:“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

① 雷蒙德·怀利、林育川:《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

② 《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sup>①</sup>周恩来甚至提出了“因时制宜”地实行“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sup>②</sup>的主张。

这种思想萌芽在党的其他领导人身上也有体现。1923年5月,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划”“目前的政治运动”,他提出可以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sup>③</sup>。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给中共旅莫支部作中共党史的报告中就提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sup>④</sup>1927年2月,瞿秋白在他的论文集自序中,第一句话便使用了“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来开篇明义,并认为陈独秀和自己“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来说“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sup>⑤</sup>。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开始探索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这一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必须要解决的历史难题。然而当时社会政治环境是,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理论层面高度,当时还仅仅处于一种不自觉和无意识的状态。不过这都为后来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sup>⑥</sup>

## 第二,马克思主义“本本”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国内面临着白色恐怖,党的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或

① 《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0—481页。

②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1页。

③ 《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

④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⑤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415页。

⑥ 张远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与奠基——以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为研究视角》,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小块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内。虽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认识到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但也正是在这时,党内却出现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这说明,当时还不具备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语境,正如艾思奇所说:“由于抗战以前的特殊情形,理论研究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样的脱离现象,使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始终限制在介绍性质的,书本式的,通俗化性质的活动范围内。”<sup>①</sup>

针对党内存在着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在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sup>②</sup>、“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sup>③</sup>等论断。正是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毛泽东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为制定适合于中国革命的政策、理论提供了可靠的事实依据,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而“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sup>④</sup>。毛泽东通过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总结,写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论证了中国革命应该采取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这些建立在中国实际情况基础上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做了初步的探索和积累。

土地革命前期,党内先后出现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尤其是自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开始在党内推行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不顾中国的实际国情,给中国的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党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达到顶峰,在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总结,会议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

①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5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7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sup>①</sup>，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实际领导地位<sup>②</sup>，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开始在中共中央居于主导地位”<sup>③</sup>，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奠定了组织基础。

###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斗争，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和1934年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方式和前途、照搬俄国革命模式以及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有了新的认识与反思，开始尝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通过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正反面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从不自觉、半自觉到自觉的过程，经历了从朦胧到清醒的过程”<sup>④</sup>。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在分析为什么会出现关门主义时，《决议》指出，其中的一个原因为“基本的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的环境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sup>⑤</sup>。这种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出现的说法，已经与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本质非常接近了。1936年3月23日，毛泽东在晋西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sup>⑥</sup>7月23日同斯诺谈到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关系时说：“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

---

① 逢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5—366页。

③ 薛庆超：《中国现代史论·第一卷：长征中的重大决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④ 余品华：《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原因和契机》，《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7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

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sup>①</sup>1936年12月毛泽东完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前五章写作,该篇文章“着重解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军事路线的分歧,并作出科学的总结”<sup>②</sup>。这篇文章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深入地推进了一步。

抗战时期,尤其是毛泽东到延安以后,由于有了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为了“系统总结中国的革命经验”,同时“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理王明的‘左’倾路线的错误”<sup>③</sup>,毛泽东开始静下心来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等方面书籍,撰写了大量的哲学、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等方面文章,这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中国化、民族化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杨炳章把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比喻成“一家临近破产的企业”,而毛泽东是“工作勤奋”、具有“超凡魅力”和“富有远见”的“企业家”,毛泽东“除了教给同事们专业技术上的技能外,还给他们讲授创业家所需要的基本道德伦理。毛泽东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如同新教徒引用圣经一样——两者都是作为实践活动所必要的精神鼓舞——而从来不相信无论马克思还是上帝会保佑那些自己不能照顾自己的人。”<sup>④</sup>

1937年7月的毛泽东完成了《实践论》,8月完成了《矛盾论》,这两篇文章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sup>⑤</sup>、“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sup>⑥</sup>而写的。这两篇著作阐明了党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指导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的经典哲学著作,为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sup>⑦</sup>。《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完成,表明在毛泽东自身思想理论准备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第129页。

② 陈雪薇:《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载《光明日报》2012年6月13日第11版。

③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2页。

④ 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郭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

⑦ 《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